

“涨”字背后有何蹊跷？

——代表委员解析物价“三大矛盾”

 聚焦全国两会
新华视点

“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跟涨”的大宗商品、“待涨”的水电油气……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

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究源、建言献策。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

央行发布的2011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8.7%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去年8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年5.4%的涨幅仍远超年初4%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漲？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

“政府还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供，严防投机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替散户种养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

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委员说。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贱卖”，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提。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一；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记者 刘元旭 刘敏 王海鹰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进入代表驻地酒店要经过比机场还严格的安全检查。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负责人民大会堂通道安检的武警在交接班。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配备电动警车的公安干警在天安门广场巡逻。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两会发言集锦

“只要政策对头、重视科技、投资到位，农业一定是一个大产业、好产业，而且效益不会比工业差。”

——全国人大代表、
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劳模脱离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就会失去养分，就会枯萎。”

——全国政协委员张海迪

“如果人人都能把雷锋精神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生活就更美好。”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兰

“雷锋精神的生命力，既在于它的无私和伟大，也在于它的平凡和一贯。”

——全国人大代表栗俊平

“以实际行动学习实践雷锋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应该追求的道德高度与力量，也是新时代公民的精神标杆。”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

“各地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建设和维护规划馆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把老百姓呼声高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摆在优先位置。”

——全国人大代表、
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聚焦全国两会
话题

彻夜排队报名，亲子班“占坑”、“条子生”泛滥……进入3月，全国各地家长们的“幼儿园报名战”已经提前打响，种种乱象引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们高度关注，纷纷建言如何破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发展学前教育，政府是第一责任人

对于农村幼儿园的薄弱现状，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白庙乡白庙村农民毕红珍有着一肚子话：“西部农村的幼儿园极其缺乏。白庙乡虽然建了一所幼儿园，但由于缺老师、缺资金，到现在一直都没投入使用。”毕红珍认为，农村幼儿园，首先要靠财政支持，师资、资金等方面必须予以倾斜。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王义说：“据我了解，好多幼儿园留不住老师的原因就在于幼儿园教师的待遇非常低，社会地位不高，且职称晋升渠道缺乏。国家应出台政策，保障幼教老师的合法权益。如果能设立‘高级幼教’这一职称，将会吸引一大批人才进入这个领域。”

“陇南礼县大坪村的老支书，为解决村里娃娃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把办公用房腾了出来，请村里初中毕业的女娃娃回来当老师。县里认为这个做法很好，想给他们支持部分

人大代表热议—— 破解城乡学前教育难题

资金，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科目，教育经费里没有这个开支。”王义说，“这就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了，必须从机制制度上来设计办幼模式。”

对于学前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表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他说，去年底江苏省印发的《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实施意见》，对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提出了明确要求。

切断权力寻租，杜绝“条子生”“占坑生”

在一些大城市的部分优质公办幼儿园招生中，“条子生”“占坑生”数量占有相当比例。少数幼儿园每年招生不足百人，但收到的关系条多达数百张。

“杜绝‘条子生’‘占坑生’，关键是切断权力寻租渠道，领导干部要做表率。”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启东中学校长王生认为，优质公办幼儿园日益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加上权力寻租，是“条子生”“占坑生”泛滥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难题，除了继续做大做强整个学前教育，还应促进幼儿园阳光招生、规范招生。

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泗洪县界集镇实验小学教师裴昌彩看来，城市幼儿园“择园”现象突出反映了当前民办园收费高、办学水平低的问题。“家长们一窝蜂选择的大多是优质公办园，民办园往往陷入‘投入不足，办学水平低，生源缺乏，资金不足’的恶性循环。”裴昌彩表示，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发展公益性民办幼儿园，提高民办园水平，同时通过财政补贴降低其收费，从根本上缓解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用立法解决学前教育“最短板”

王义说：“必须从立法上对学前教育予以支持。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的立法，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看，足以负担得起。”

沈健几年来一直呼吁为学前教育立法。今年3月1日，《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在他看来，“这标志着江苏学前教育向前迈出一大步。”

沈健说，发展学前教育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不仅要短期重点突破，更需法律制度长期保障。随着家长对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的需求日益突出，必须转变观念，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学前教育发展新理念。

裴昌彩也认为，在条件成熟时，应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渠道。目前，各地高度重视农村幼儿园建设，校舍、设备等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提高，但严重缺乏合格的教师，高校应加大学前教育专业师范培养力度，同时有关方面应提高农村幼儿园老师的待遇。

记者 凌军辉 刘阳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聚焦全国两会
建议

黄海委员：补贴低收入群体标准需调整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刘铮南辰）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建议，把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与农产品价格涨幅挂钩，而不是与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挂钩。

黄海委员指出，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群体。而CPI包括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结构和水平差异很大。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以现行的CPI作为依据显然不够妥当。”黄海指出。

康厚明代表：伤残农民工维权很艰辛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张艺朱薇）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最关注维护伤残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为的是不再让伤残农民工维权之路一走几年。

康厚明在两会上将提交《关于农民工工伤诉讼索赔权的建议》。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接触了约30名因工伤致残的农民工，对其中的一部分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调研。他了解到，农民工在劳动中受伤后，时常会遇到企业否认劳动关系的现象，而他们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权的程序又太繁琐。

他告诉记者，年仅29岁的农民工王其峰，因施工作业造成下肢瘫痪，通过法律诉讼方式维权都两年了，可是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到一半。王其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在家里照顾他，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连生活都困难，更谈不上去医院治疗了，目前只能在家里疗伤。

康厚明说，农民工受伤后1至3年得不到赔偿的现象很普遍，漫长的维权时间令伤残农民工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他建议，结合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简化处理工伤、工伤事故的诉讼程序。同时，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解决工伤、工伤事故中的作用。

他还建议，统一、简化、细化、公开认定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及帮工关系的标准，便于识别和处理。将承揽关系作狭义处理，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不轻易认定为承揽关系。

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光荣的几年。”即使任期满了之后，他也会继续关注农民工群体，继续为这个群体通过各种方式提出建议。

涂建华代表：为制造业“减负”迫在眉睫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朱薇张艺）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涂建华呼吁，制造业大国为制造企业“减负”迫在眉睫，刚性的政策调控应竭力营造实业致富、技术创新发明致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为营造“实体致富的社会氛围”提供必要的行政条件。

“当前我国经济生态环境日趋恶劣问题值得忧虑，产业资本都想拼命挤进与土地、资金等关键要素最近的位置，制造业面临‘空心化’之危。”涂建华说，诸多窘迫迫使一些制造业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长期在“短期行为”中挣扎徘徊。当前，不少民营中小企业业主已心生退意，或另图别径。曾经的进取精神正被“弃船心理”所湮灭。这对国家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涂建华说，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仍未摆脱总体质量不高、原创基础能力薄弱、资源与环境损耗较重等“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中小制造企业普遍受到税负过重、要素价格高企、盈利空间收窄、融资困难等“生死考验”。

“为制造业‘减负’已是迫在眉睫。”涂建华说，建议积极吸取并借鉴美、英、德、日制造业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注重民间力量对制造业及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国家出台的“减负”措施既要一般普惠，更有重点激励；既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刚性的政策调控应竭力营造实业致富、技术创新发明致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抑制投资暴富和“炒作”经济的生长空间，对垄断行业和暴利行业课征重税，从而为制造企业提供出减税的空间。

拿着自己带到两会的人大代表建议，涂建华向记者列举了三条亟待落实为制造业企业减负的具体措施：一是真正做到对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减负、取消不合理的税(费)项设置，构建财税支持体系，让制造企业“休养生息”。二是针对中小制造企业融资难、代价高的普遍问题，建立专门的融资服务体系。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使民间资本和国资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运营通道。

李健代表：长江中游应挺起“龙身”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李鹏翔 皮曙初）“若将长江比作巨龙，上海是‘龙头’，重庆为‘龙尾’。从发展现状来看，‘龙头’已经舞起来了，‘龙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动作也不小，而位于长江中游的‘龙身’似乎相对平静。”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在全国两会上建议，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应当挺起“龙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抱团放大中部能量，使该城市群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引擎。

李健指出，沿长江呈“品”字形分布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鄂湘赣三省乃至中国中部地区经济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经济总量已接近珠三角城市群。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不仅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而且对

带动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和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要意义。

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携手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构筑中部“金三角”，已经成为湘鄂赣三省的共识。今年2月10日，湘鄂赣三省主要领导在长江之滨的武汉签署《共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致力于三省基础设施、产业、市场、文化旅游和生态保护“五个一体化”建设。三省的交通、旅游、商务部门也分别签订了具体合作发展协议，并建立起定期协商、沟通、交流机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时代。为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使之在新一轮发展中推动长江流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增长，李健建议，在三省合作共推的基础上，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湘鄂赣三省政府，着手编制《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让雷锋精神成为海南发展新动力

(上接 A1 版)假文凭、假药、有毒食品等已经触及底线，我们不能再熟视无睹，要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倡导社会新风，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不断加强信用建设。

“软实力可以立国，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要在全社会宣传雷锋精神，坚决打击一切假冒伪劣产品及坑蒙拐骗行为，大力推行诚信建设。”董石军强调，学雷锋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积极落实在行动中，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学雷锋

“学雷锋，贵在平时，贵在自觉。雷锋精神是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给我们的人生以丰富的营养，学雷锋本身就是在学习如何做人。”冯川建委员告诉记者。

“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在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尤其应该发扬光大，雷锋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冲刷之后，雷锋这个调整了几代人的战士，在冯川建心中是一个永恒的记忆。

雷锋是来自基层的普通一兵，老百姓对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熟悉感。在学习雷锋活动中，从基层也涌现出大量“学雷锋先进分子”、“学雷锋标兵”等典型人物。冯川建认为，在学雷锋活动中，领导干部、企业家等，要率先垂范，要比一般群众有更高的要求。

“政府官员、企业家在学雷锋活动中，要深入基层，沉下心来，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盼，掌握群众的疾苦，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调研，多办一些好事、实事。”冯川建说，只有心里装着群众，一心想着群众，才能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本报北京3月4日电）